

北方民族丛书

主编：张璇如 韩俊光 吴肃民

东夏史

王慎荣 赵鸣岐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东 夏 史

王慎荣 赵鸣岐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北三河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286千字

1990年10月第一版 199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定价：4.80元

ISBN7-80504-150-4/K

《北方民族丛书》

序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觉民族实体。这个民族实体的构成，是居住在中华大地上56个民族，包括在历史上已消失的古代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尤其是经过近百年来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形成的。在她形成的过程中，北方民族有其重要地位和作用。

祖国的北方，一般来说是指长城内外的广阔地域，是人类最早栖息繁衍的地区之一。它是古代华夏族的摇篮，也是少数民族纵横驰骋的舞台。在夏代，历史记载“东渐于海，西被流沙”的疆域内，就有“岛夷卉服”的民族。在商朝的周围，西方羌方、吉方、土方、鬼方和𤞵方，东部有东夷。春秋战国时，北方有狄族，西方有诸戎，东北方有胡、肃慎、秽、貊。同时存在着“蛮夷戎狄，犹猎处内地”的民族杂居局面。秦汉时，有乌桓、鲜卑、扶余、挹娄、匈奴，西羌和西域诸族。魏晋南北朝时，北方又出现柔然、敕勒、突厥和吐谷浑等族。隋唐时期，东北有契丹、奚、室韦，靺鞨，西部及西北部有突厥、回纥、吐谷浑。宋辽金时期，北及东北方主要是契丹、女真，西部则是党项、羌和西夏。元代，蒙古族崛起北方，雄踞全国。明末，满族兴起东北，君临中华大地。之后，居住在北方的有满族、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回族、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塔、塔塔尔族、撒拉族是从中亚一带迁徙来的，朝鲜族则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陆续从邻国迁移来的，形成为今日多元的

统一的民族格局。这些民族兴衰嬗替，来来去去，兼并融合，谱写了一部历史悠久、民族纷杂而又五彩缤纷的画卷。

她们以不同的生产手段，或耕、或牧、或渔、或猎，用勤劳和智慧，共同开发了去方的沃野和草原，开发了祖国的北疆。

她们所创造的绚丽多姿的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鲜明的民族风格，不仅构筑着、丰富着中原文化，而且以其独特的地区和民族特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

北方民族在历史上，有的建立过地方政权或民族政权，有的统治半个中国，有的统治整个中国。她们都以自己的智慧和创造力，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北方民族同全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主要居住在边疆，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北方民族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这种“情状”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内聚力的表现。

本丛书所收著述，是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的结晶，或多年来多方搜求的资料汇集，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独立成篇，各书之间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凡是有关北方民族的著述和资料均可收入。目的在于活跃学术，为构筑民族研究大厦添砖加瓦。

我们在编辑这套丛书过程中，得到了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央民族学院古籍整理办公室、吉林省民族研究所、延边历史研究所的鼎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因编辑水平所限，错误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批评指教。

编 者

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前 言

东夏是我国历史上金、元两代交替之际，在东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称国改元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成为金史、东北史、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内容。可是《金史》、《元史》皆不为立传，仅有极为简略的夹叙附见式的记载。直至近代曾廉、屠寄、柯劭忞在他们所改编的《元书》、《蒙兀儿史记》、《新元史》中才增写了东夏创建者蒲鲜万奴的专传，填补上《金史》、《元史》遗漏的空缺，除了将零散的资料缀辑，成篇之外，也又提出或涉及一些须加以研讨阐释的问题。金毓黻进而探索搜求，把东夏史的研究推到一个新阶段，在所著的《东北通史》中写有《蒲鲜万奴之东夏国》一章。此后，史学界进而对东夏的国号、国都、官制、人物等专题开展研究，被湮没许久的东夏历史始引起注意。我们尽力搜集足资参证的史料，质直吸取中外学者研究成果中的识见，审慎作出认为应有的考辨，对东夏史存在的诸问题，一一进行分析探讨，编成此书，以求恢复东夏在我国历史上的应有地位和导致公允的评价。

东夏从建国开始到最后消亡，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215年至1233年。自蒲鲜万奴建立东夏政权，到蒙古军攻克南京擒万奴，经过19年的时间。蒲鲜万奴以其充任金辽东宣抚使的职责经历，深知金朝败亡的危机已无可挽救，唯有改弦更张别建新业才有复兴的希望，因而趁他还掌握一部分兵力，占据东北一隅之地，初号大真，继改为东夏。这就一方面要对付金朝在东北的残余势力借口平叛的声讨，一方面要建制树立国体的规模，更为重要的是须力求避免与蒙古直接发生冲突，于是采取了以屈求伸，待机而动的策略，表面上降服于蒙古，实际上保持独立自主

的势态，尽心极虑在图谋挣脱蒙古的羁绊，这就形成了十几年间既不得不屈从于蒙古，又一再伺隙断绝交往反反复复的局面。及至1233年，蒙古征服西夏，金朝的残余势力基本上被剪除，遂出兵东向，攻下东夏重镇南京，擒俘万奴。至此时，东夏脱离蒙古独立已告绝望，是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自1234年到元世祖至元年间，东夏仍以作为元朝的内属藩国地位，又继续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其特点是：东夏在作为蒙古和元朝的藩属，仍然保持一定的疆域和武装力量，设官置守，还成为一个国家实体。当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灭南宋统一全国以后，这样一个仍保持半独立国家局面的东夏，自然不可能再允许存在下去，于是被取消划归辽东行省而成为元朝帝国直接统治的一个地区。

考察金朝发展的历史，东夏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是金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公元1125年，金灭亡北宋，从这时起一百多年，直到金朝灭亡，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呈现出颇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是金与南宋、西夏之间的对抗和混战，一方面是金朝在北中国的统治区域内各族人民的不断反抗斗争。13世纪初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以后，又增加了蒙古南下与金、西夏间发生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斗争。这时南宋在对金的关系上，始终存在着主战、主和，对抗、投降两派。表现为时战时和，打打停停，和战交替的局面。1206年，南宋韩侂胄乘金朝北边受蒙古侵逼、国内矛盾异常尖锐之时，起兵北伐，企图以此树威固位，结果一败涂地，韩侂胄被割掉了头，函首押送金朝赎罪。以后力量更趋衰弱，虽然外结蒙古，覆灭金朝，但不仅毫无所得，反而把自己摆到遭受蒙古直接攻侵的地位。

蒙古的侵逼，使金朝统治集团的腐朽乖谬完全暴露出来，“国虚民穷，经用不足”，“政乱于内，兵败于外”。卫绍王“柔弱鲜智能”，“苛吝，不知人君体”^①，对蒙古的入侵，只

^①刘祁《归潜志》卷12，《金史》卷13。

有君臣对泣，屈辱求和，以致“权臣得柄，内外交病”，遭到被纥石烈执中杀害的下场。宣宗继位，不但不能有振作，进而更畏敌如虎，放弃中都，南逃汴梁，河北、山东相继沦陷。只图“苟延幸存，以延岁月”。结果“内致疲惫，自速土崩”^①。金哀宗再勉强支撑十六个年头，终于在公元1234年为蒙古消灭。

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开始侵金，到公元1215年就攻破城邑860多座，几乎黄河以北大片土地都遭到蒙古铁骑的蹂躏。同时，耶律留哥兴兵于辽东，红袄军起义于山东，纥石烈执中杀卫绍王，又被术虎高琪所火并。外患内忧，交乘叠至。金朝危亡已成定局。这期间，蒲鲜万奴被金廷先后任命为咸平路招讨使、辽东宣抚使。来到辽东，经受由蒙古支援的耶律留哥两次给予的挫败，他即察觉到这个地区，金朝的统治难以维持下去。他不能就此坐待危亡的到临，更使他感到急迫的是伎刻猜忌的金宣宗已对他怀疑，可能不时即遭重谴，因而只有改图另举，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即可振奋人心，以求民族的复兴，又可免受金朝的制约处置。因而当机立断，迅即立国改号，初名大真，意图以振兴女真族为号召，继而很快又认识到女真族是中华民族的一支后裔，东北地区是华夏各民族协同经营生息的一个基地，应明确地应用自古以来华夏的通称，改国号为夏。当时西北地区的地方政权已先称西夏，人们为资区别，称做东夏。

东夏立国经历半个多世纪，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一定丰富的值得研讨的史实，当时史馆视之为叛逆僭越屏弃不予记载^②，修《金史》时即无从采择，而志在修史网

①《金史》卷18《哀宗纪下》。

②《金史·宣宗纪中》兴定二年（1218年）四月，“遣侍御史完颜素兰、近侍局副使讹可同赴辽东，察访叛贼万奴事体”。当然会有察访情况回报。《金史·哀宗纪上》正大三年（1226年）六月，“诏谕高丽及辽东行省葛不孛，讨反贼万奴”。在这以前辽东行省机构仍存在，当然也会陆续呈报东夏国事体。但是宣宗、哀宗二本纪皆无只字记载，自是由于当时史馆屏除不作采录，写《金史》时自然无所著笔。

罗史事并各有著述的名家如元好问、刘祁、王鹗等人也都对东夏史料，未能重视，不予搜集，修《元史》时更无所采择，竟致造成一段空白，留下一大缺陷。沉埋了几百年之久，才由曾廉、屠寄、柯劭忞各为之补进《蒲鲜万奴传》。他们都是意在修正《元史》的“纰漏”，《蒲鲜万奴传》只是聊备一格，并未对东夏史下工夫披寻资料探索问题，从而引起人们认为应对东夏史进行探讨。日本学者小川琢治的《完颜古城址考》、箭内互的《东真国疆域考》、岩井大慧、池内宏的关于蒲鲜万奴的国号的论证等，是较早的研究东夏史专题的文章。我国学者金毓黻先生在所著《东北通史》中的《蒲鲜万奴之东夏国》一章和《辽海先览志——王浚》一文，对东夏的国号、疆域、国都等方面和对蒲鲜万奴、王浚这两位人物都进行了探讨分析，并提出了值得重视的看法。这是三、四十年代中外学者研究的成果，七十年代以后，史学界进一步开展研究，对东夏史进行了某些专题论述和考评，提出的观点和阐释，多有所发挥裨益，但仍各持己见，未能取得一致的认定。所以会产生这些情况，主要是因为文献材料既零散又简略，而且还颇有异文歧义：如东夏国号见于《元史》、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高丽时期徐居正等的《东文选》称之为东夏，而朝鲜时期郑麟趾的《高丽史》却称之为东真；蒲鲜万奴在《元史塔思传》中又称之为完颜万奴。于是国号究为东夏抑为东真，万奴何以有蒲鲜、完颜两姓，即成为引起争论的问题。还有东夏的国都、年号、疆域等问题也是众说纷纭。至于说东夏城市和经济发展，过去所以无人问津，其有关材料更是只鳞片羽，难窥全貌，须经反复发掘考证才能粗得梗概。

东夏是我中华在13世纪领有今吉林、黑龙江两省大部、东至日本海的疆土，立国半个多世纪的地方政权。虽然文献记载零散简略而又有所歧异，对研究带来很大烦难和不少问题，但是若把这些材料深入分析比较，相互勘合参证，还是可以稽考出大体概要的。最近出版由蔡美彪等人所著的《中国通史》第六册，其中

就有《蒲鲜万奴的叛乱》一小节，韩儒林先生主编的《元朝史》，其中有《辽东争夺》一节，对东夏的建立及其失败，进行了概述。张博泉先生的《金史简编》，也写了《蒲鲜万奴东夏国》一节，《东北地方史稿》也专门写了《东夏国的建立》、《东夏国的都城和疆域》、《东夏国的灭亡》，于志耿等著《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也写了《蒲鲜万奴与东真国》一节。可见对东夏史的研究已愈益引起治史者的重视，而认为是一段须填补并尽求充实的课题。

我们试图从金朝末年的东北形势，演化分析东夏所以建国，从金朝残余势力和蒙古、高丽几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探索判断东夏的存在及其疆域四至；从其政治、经济、军事的建制、设施、部署，说明东夏的历史地位。同时对东夏的国名、年号、国都、官制以及疆域等存在分歧的所有情事和问题，都进行阐述论说，对史料中的歧异记载也作了应有的考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书中对所有研究的问题，可以说都有新的观点。东夏的经济、东夏的城市等章节，从材料到观点可以说是全新的。

书中有两个问题还须申说一下：一是如何看待东夏的历史地位，一是对蒲鲜万奴应作如何评价。

东夏在十三世纪初期，作为一个独立和半独立的国家出现于东北大地，存在了70多年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继渤海国之后，又一个仅有的不由累世经营开拓形成而是在极短的时期内即草创起来的新国家；这个政权存在的时间，和两晋的十六国、五代期间的十国这些既载在正史又多有别史的地方割据建号称尊的政权相比较，除了钱氏的吴越延续有86年之外，再没有能经历及70个年头的。因此，阐明东夏在历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弥补《金史》、《元史》留下来的遗误，是必要而又切要的问题。

关于蒲鲜万奴的评价，自为之写出补传以来，即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是否定的，认为蒲鲜万奴是个人野心家，在搞“叛乱”，使金朝分裂内讧削弱抵抗蒙古的力量，应该给予谴责批

判。一是肯定的，称许万奴为“辽东怪杰”，或赞誉可为“媲美阿骨打”。前一种看法反映封建纲常正统思想，后一种看法，带有感情色彩，可以说是对前一种看法的矫枉过正。金毓黻先生较早研究东夏史，提出的看法似较为公允，其见解也取得史学界的首肯；但对蒲鲜万奴的称许似稍嫌拔高。究竟如何评价蒲鲜万奴这位历史人物？我们认为应从实际具体的历史环境条件分析。我国自秦、汉形成中央集权统一的大帝国，评价历史功过就相应以能否维护统一、安定社会为准，而这个准绳又须以历史实际需要为衡量依据。当局势正常，如有谁制造分裂企图割据，自就是历史上的罪人；当国内外民族的阶级的矛盾激化，统治集团腐败无能到不能维持统一安定时，群雄纷起，各有千秋，那就不应一律看作是叛逆内乱自相火并。蒲鲜万奴的脱离金朝，别创东夏是当时金宣宗小朝廷局促于河南一域，辽东隔绝海外，形势混乱，地方军政官司各行其是，纪律荡然；派青狗招降耶律留哥，青狗反投留哥，辽东、上京宣抚使蒲察移剌都擅离职守转去汴京，伯德胡士以私怨杀害辽东行省阿里不孙，上京行省太平以应合万奴拘执元帅承充，金朝的统治已不起什么作用。这时蒲鲜万奴抛弃它而另建新猷，这在实质上应视为是进步行动，怎么能食古不化反而给予叛逆割据的恶谥呢？元朝那时还没有平定中原，东北也没有置于统治之下，当然以为是对蒙元的割据，更属牵扯不上。在蒙古武力横扫亚洲大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面前，蒲鲜万奴居然和蒙古对峙相抗近20年之久，能不说是一代杰出人物吗？在蒙古强大军事重压和地方各种势力瞬即消长的变化情况下，在东北地区逐鹿的一些人都告败亡，万奴却能在辽东地区搞起东夏政权来，一直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如不是具有坚毅不拔的意志、知人善任的统帅器度、随机应变的才能，取得这么异乎寻常的奇迹般的成就，倒是不可思议的了。东夏的建立，虽然由于当时形势错综复杂，未能蔚为大国而偏处一隅，但处在成吉思汗进行杀掠一空的凶残侵略战争面前，能设法与之周旋，免遭涂炭，就可谓之一大功

绩；经营几十年，为开发东北、为元朝统一全国奠定历史基础，其事迹应该给予应有的阐述与评价。这仅是我们的一些基本看法，希望能在学术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们对东夏史的研究虽然接触的较早，但开始只是对东夏的国号、国都一些个别问题进行探讨。近几年来，随着文献、考古材料的不断增加，感到对东夏史有全面研究、系统写出通书的必要与可能，因而不揣樗味，草创纂著这本《东夏史》。在写作过程中，又切感材料仍然不足的困惑：有的问题就难作头头是道、丝丝入扣的论证；有的问题就只可作类比隅举，以彼例此的推演；有的为求证一件情况一个事物，不得不在已搜集到的那些资料中反复推敲悉心考索以期获得能以参用的东西。就是这样历经多次修改才完成了这本书稿。

本书稿是我们共同商讨，分头执笔完成的。具体分工情况是：前言、第二、三、四、五、八、十一、十二章和附录，由王慎荣执笔；第一、六、七、九、十、十三章由赵鸣岐执笔。叶幼泉先生虽已届八十岁高龄，对书稿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书稿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吉林省民族研究所张璇如等同志的热忱帮助和支持，并对书稿提出一些宝贵意见。本书能得以出版是与他们的奖进和帮助分不开的。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东夏史是个材料不足、从未进行过全面研究的大题目，书中的许多问题虽进行了论证考辨，但由于我们的学术理论水平有限，文献资料仍感未能充分齐备，对国内外研究成果也了解不够全面，因此，不足与谬误之处一定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希望国内外史学界的同仁们提出批评指正。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金朝末年的东北形势	(1)
一 金朝东北社会的主要矛盾	(1)
二 耶律留哥起义反金与投附蒙古	(9)
三 蒙古的辽西经略和蒲鲜万奴的建国	(15)
第二章 东夏国创建者蒲鲜万奴	(24)
一 蒲鲜万奴的姓氏	(24)
二 蒲鲜万奴的身世	(32)
三 转战南北	(36)
四 辽东宣抚使	(42)
第三章 东夏国的建立	(47)
一 建国以前,先行举旗兵变	(47)
二 建立政权,国号大真	(52)
三 降附蒙古	(57)
四 改建东夏政权	(61)
第四章 东夏的国号	(67)
一 立国之初,国号大真	(67)
二 大真之后,改称东夏	(75)
三 东夏何以又有东真之称	(81)
第五章 东夏的年号	(88)
一 天泰纪元	(88)
二 大同纪元	(92)

第六章	东夏的都城	(101)
一	东夏国都城为开元	(102)
二	东夏开元城治址	(114)
第七章	东夏的疆域	(125)
一	关于东夏疆域的几种说法	(125)
二	关于辽东和东海地区	(129)
三	关于东夏的疆域四至	(134)
第八章	东夏的官制	(144)
一	中央机关	(144)
二	军事系统	(149)
三	地方组织	(159)
第九章	东夏的经济	(167)
一	东夏的主要生产方式	(167)
二	东夏各部门生产的发展	(170)
	农业	(171)
	手工业	(174)
	采捕业和畜牧业	(178)
	商业贸易	(179)
第十章	东夏的城市和长城	(182)
一	东夏的城市	(182)
二	东夏的长城	(189)
第十一章	东夏国丞相王恚	(197)
一	辽东名士	(199)
二	艺林行家	(203)
三	金朝薄宦	(208)
四	《易》学别派	(210)
五	东夏丞相	(213)
六	生平终结	(216)
第十二章	东夏和蒙古的关系	(220)

一	蒙古和金朝势力的转化·····	(220)
二	成吉思汗与蒲鲜万奴·····	(224)
三	东夏与蒙古·····	(230)
第十三章	东夏与高丽的关系·····	(246)
一	蒲鲜万奴自立和建立政权时期与高丽的关系··	(246)
二	东夏国兴盛时期与高丽的关系·····	(251)
三	东夏称藩时期与高丽的关系·····	(260)
附录一	东夏史系年纪事·····	(264)
附录二	徵引和参考文献、文章目录·····	(299)

第一章

金朝末年的东北形势

公元12世纪初，由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在我国北方建立起来的金王朝，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朝代之一。它的120年兴衰史对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对当时北方社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进步，以及对东北地区的开发和东北北部疆域的形成，都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和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是，由于女真统治阶级所发动的侵宋战争和对国内各民族人民的残酷奴役和压迫，致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贯穿于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而且愈是到金朝统治后期，这种矛盾和斗争表现得愈是激化突出。

一、金朝东北社会的主要矛盾

东北，是金朝的“龙兴”之地，前期政治统治的中心。金朝历届统治者对于东北地区都十分重视。开国皇帝太祖完颜阿骨打全力经营东北。他在统一相邻部落和积极进行对辽战争的同时，即非常重视对东北地区的开发。为了充实“内地”（金初称松花江中下游地区为内地，即后来的上京路辖区），他施行了移民实内政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①。其中曾将山西诸州部民徙至上京（今阿城县白城子）、岭东（今张广才岭以东）地区，将燕京附近“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迁往“内地”。^②同

①《金史》卷133《张觉传》。

②《金史》卷46《食货志》。

时，也较为重视对辽东地区的经营。金军占领东京附近州县后，“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①，加强对那里的渤海人和汉人的控制和管理。“其后抚定奚部及分南路边界”，“依东京渤海列置千户、谋克”^②。并实行屯垦，注意发挥猛安、谋克组织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天辅五年（1121年），特委派婆卢火率“诸路猛安、谋克之民万户”，“赐耕牛五十”，屯田于泰州地方，开发东北西部地区^③。太宗完颜吴乞买统治的十三、四年时间里，虽说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到中原，发动大规模的侵宋战争，但是对东北的经营却并未放松。他一方面承袭先兄的作法，继续移民于东北，并命给曷懒路诸谋克以土地，恢复东北东部地区的农业生产^④；一方面加强对整个东北地区的行政建设与管理，在太祖建国之地建都称会宁府，“定官制，立尚书省以下诸司府寺”^⑤，确定东北地区疆域，使金朝在继承了渤海和辽旧壤的基础上，又向北和东北方面有所发展，将兀的改、吉里迷等部地统一管辖起来，使疆域东北至混同江（今黑龙江）下游地区，东到海，北抵蒲与路治所以北三千多里之火鲁火曷谋克地（今外兴安岭一带）。金熙宗即位后，对金朝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兴建会宁府宫殿，将会宁府建号为上京，并一仍辽、宋旧制，在东北地区设立路、府、州、县，使金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加强。历史发展至金朝中期，在东京辽阳府登基的第五世皇帝金世宗对东北也十分重视。他吸取海陵王正隆末年契丹农牧民大起义的教训，与民休养生息，注意发展生产，使当时辽河、混同江流域各地的农业生产技术有了相应提高。同时下令重建被海陵王毁坏的会宁府宫殿，恢复上京称号。为防御鞑靼铁骑

①《金史》卷2《太祖本纪》；《金史》卷71《完颜翰鲁传》。

②《金史》卷77《完颜拙懒传》。

③《金史》卷2《太祖本纪》；《金史》卷71《完颜婆卢火传》。

④《金史》卷3《太宗本纪》。

⑤《金史》卷78《韩企先传》。

南下，还在东北西部修筑长达几百公里的东北路界壕边堡和西北路屯戍边堡。他在大定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1184—1185年）亲自巡视东北，抵达金旧都上京会宁府，以示其对该地区的重视。至宣宗统治时期，北方蒙古进逼，仍有人谓：“辽东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备御一面，以为后图”，建议迁都辽阳府^①。后来，由于紧急军情需要，还于东北地区先后设立辽东路行省、婆速路行省和上京路行省等临时特殊机构，以加强对该地区的军政管理。

尽管如此，并未因此使贯穿于金朝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有些许缓和。相反，爆发于金中叶的农牧民大起义——撒八、窝斡起义和稍后一些时间的特满群牧契丹人德寿、隋锁领导的契丹人起义以及同时期发生的由北方各少数民族组成的乱军起义均发生在这里。所以，作为金朝发祥地的东北，既是统治者努力经营的场所，同时也是各种矛盾斗争的集中地。发生在东北的这些起义和反抗活动，其性质虽不相同，具体原因也各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这就是均因不堪忍受金朝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以及金朝最高统治者的动摇不定、变化无常的民族政策造成的。

金朝建国后，女真统治者对境内人民实行了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三朝北盟会编》载：金“有兵权、钱谷，先用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契丹时不用渤海，渤海深恨契丹；女真兵兴，渤海先降，所以女真多用渤海为要职。”^②这里说了两层意思，一层是金朝对待女真和其它民族是有区别的，重用女真人，歧视其它民族；另一层是辽朝没有处理好与渤海人的关系，金朝没有处理好与契丹人的关系。这就明白揭示出：金朝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突出地表现在与契丹人的关系问题上。

①《金史》卷99《徒单镒传》。

②《三朝北盟会编》乙集，靖康中帙73赵子砥《燕云录》。